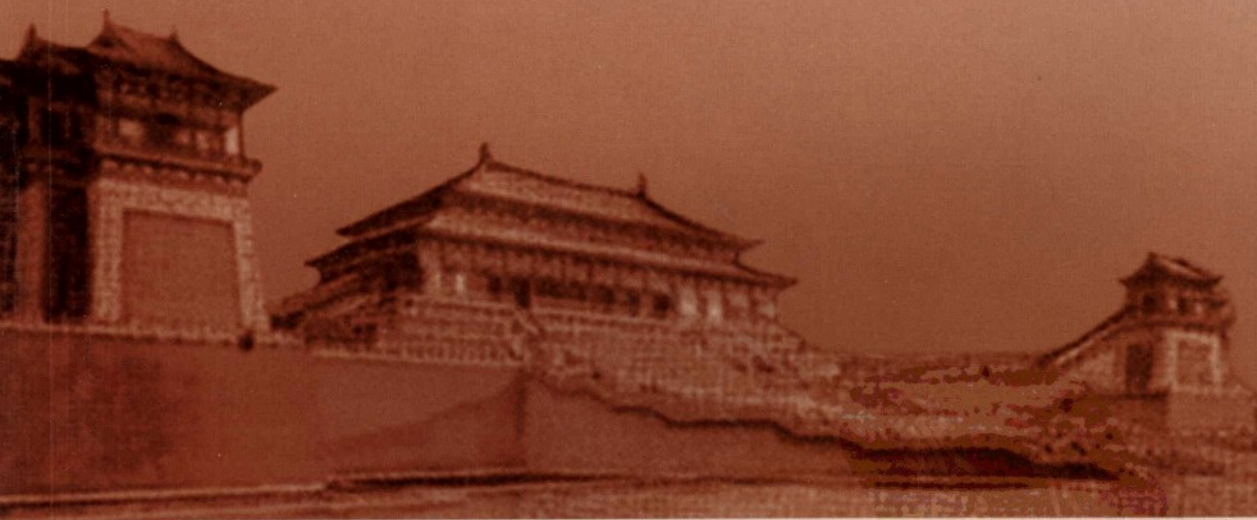


《汉书》文学论稿

潘定武 著

H A N S H U W E N X U E L U N G A O



安徽大学出版社



《汉书》文学论稿

潘定武 著

安徽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书》文学论稿/潘定武著. —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
2008. 4

ISBN 978—7—81110—418—9

I. 汉... II. 潘... III. ①中国—古代史—西汉时代—纪传体
②汉书—研究 IV. K234. 104.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30374 号

《汉书》文学论稿

潘定武 著

出版发行 安徽大学出版社

(合肥市肥西路3号 邮编 230039)

联系电话 总编室 0551—5108241

发行部 0551—5107784

电子信箱 ahdxcbps@mail. hf. ah. cn

责任编辑 老 鼓

封面设计 孟献辉

印 刷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印刷厂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6.5

字 数 215 千

版 次 2008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81110—418—9

定价 28.00 元

如有影响阅读的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序

霍松林

《汉书》无疑是《史记》之后又一部史学兼文学巨著,但由于种种原因,目前学界对《汉书》的重视程度远远不够,对其文学的研究尤其冷落。有鉴于此,潘定武君选取《汉书》为对象,从文学的角度,以通史的眼光进行全面深入的探讨,完成了博士论文,受到评审专家和答辩委员们的赞许。又经过认真修改,即将付梓。作为导师,我乐于说几句话。

定武此文的写作是在仔细阅读原典、充分把握《汉书》创作背景和全面了解课题研究现状的基础上进行的,因而立论确切,时有独到见解。具体地说,在绪论部分全面回顾了古今《汉书》文学研究方面的历史,总结《汉书》文学研究在现代遭受极大冷遇的原因,资料翔实,分析精辟。第一章从大文化背景考察历史文学从《史记》到《汉书》的转变,认为《汉书》的文学意义不在步趋《史记》,而在体现时代特色的新变。第二章中,论述《汉书》既断代为史,又具有很强的通史意识,上下洽通,在结构上较《史记》更加注意整体性和规范性。第三章论《汉书》的叙事,指出其既注重信实,追求博洽,也有必要的虚构和渲染,疏密结合、张弛有度。第四章认为《汉书》的语言不限于典重,而呈现出丰赡与简约、典雅与通俗、谨严与风趣等多方面特色的对立与统一。通过对《史》、《汉》文学风貌的多方面比较研究,定武认为,《史记》如浪漫热情之青年,《汉书》如成熟有味之中年;《史记》如挥毫泼墨之写意,《汉书》如精雕细刻之工笔。应当从文学史意义特别是历史文学发展进程中来看《汉

书》，既不能忽视前代历史文学特别是《史记》对它的巨大影响力，更要认识《汉书》自身的独特存在。而历来虽注意到《史》、《汉》创作背景及马、班个人等因素的不同，却又往往无视《汉书》历史文学的独立性，这无疑是研究《汉书》文学的最大误区。撇开这一误区的干扰，人们自会看到《汉书》之中一片独具特色的文学新天地。以上无疑都是得之于对《汉书》深入研究基础上的独到体认。

定武曾长期执教于中学，正式从事科研时间并不长，但能刻苦好学，扎实推进，硕士阶段打下了较好的基础，读博期间更是日夜兼程，心无旁骛，数年间取得了可喜的科研成果。其博士论文选题正是在博览精研的基础上的认真抉择，提纲经过多次调整，初稿成形后更是反复修改，体现了相当严谨的学风。文章虽以传统研究方法为主，但能适当融合现代西方文论、史论等新方法，显示了论证的科学性。

我在论及唐诗时曾说过，断代的研究内容需要运用非断代的即纵横贯通的研究方法，其实，对任何古代文学研究对象，都要将其置于整个文学史和当时整个社会的大背景下，关注其在文学史中与前后的联系，探索其形成的社会文化原因。可喜的是，定武此文正是将《汉书》的历史及文学成果放在先秦两汉学术文化发展的大背景下来考察，既宏观把握，又深入文本作细致分析，因而能取得有关专家较多的好评。作者在对《汉书》文学成就作充分彰显的同时，又并未失去冷静与客观，而同样注意揭示《汉书》文学上不足的诸方面，并一再指出《汉书》文学总体成就实不如《史记》，与时下流行的一味拔高自己研究对象的做法相较，这无疑也是值得一提的。

当然，肯定这篇论文的诸多优点，并不等于说它十全十美。我个人认为，班固既是史学家和文学家，又是经学家，其经学思想对《汉书》的影响是具体而深入的，而作者虽已有所论述，但还不够充分。另外，班固的文学思想对其《汉书》创作影响方面的论证，也需适当加强。

《史》、《汉》并称,而学术界至今对《汉书》研究的重视仍远逊于《史记》。定武有鉴于此撰写的这篇论文能否将《汉书》的研究引向全面深入,我愿拭目以待。

2007 年国庆写于陕西师大博导南楼



目 次

[1]	序	霍松林
[1]	绪 论	
[1]	一、课题的意义与思路	
[6]	二、《汉书》文学研究回顾	
[20]	第一章 《汉书》的创作及其文学个性	
[21]	第一节 《史记》、《汉书》与两汉学术之变	
[21]	一、《史记》的文化背景	
[24]	二、两汉之际经术思想之变及其影响	
[28]	三、《汉书》的背景及创作	
[35]	第二节 《汉书》的史学与文化意义	
[35]	一、体例方面	
[41]	二、思想方面	
[48]	三、文化方面	
[51]	第三节 从历史散文进程看《汉书》的文学个性	
[52]	一、先秦两汉历史散文的进程	
[55]	二、《史记》文学的不可重复性	
[59]	三、《汉书》文学个性概述	

[67] **第二章 《汉书》的结构形态**

[68] **第一节 整体构思：一部如一篇**

[69] 一、纪传体总体架构

[73] 二、各体内部布局照应

[84] **第二节 谋篇技巧：“点次如掌上”**

[84] 一、单篇结构严整与多样

[88] 二、篇中宾主映照、曲折弛张之法

[97] **第三节 论赞的地位与特色**

[98] 一、论赞的地位与作用

[105] 二、论赞的特色

[115] **第三章 《汉书》的叙事艺术**

[117] **第一节 叙述视角与时空特色**

[117] 一、叙述视角及其变化

[122] 二、叙事的时空特征

[132] **第二节 叙述内容：虚实与疏密**

[133] 一、纪实与纪虚

[141] 二、内容的疏与密

[155] **第三节 叙事类型：概括性叙事与呈现性叙事**

[156] 一、概括性叙事

[159] 二、呈现性叙事

[171] 三、以叙为议

[175] **第四节 《汉书》的个性化叙事**

[185] **第四章 《汉书》的语言特色**

[186] **第一节 语言之丰赡与凝练**

[186] 一、语言的丰赡雍雅

[193] 二、语言的明整凝练



- [200] 第二节 语言之冷峻与深情
- [201] 一、语言的冷峻
- [205] 二、语言的情韵
- [210] 第三节 语言之谨严与风趣
- [210] 一、语言的谨严有度
- [216] 二、语言的生动风趣
- [222] 第五章 《汉书》的文学影响
- [222] 第一节 《汉书》著录西汉作品概况及其文学意义
- [222] 一、《汉书》著录西汉作品概况
- [224] 二、《汉书》著录西汉作品的文学意义
- [227] 第二节 《汉书》的传播及“汉书学”
- [228] 一、早期传播
- [231] 二、“汉书学”的形成
- [233] 三、《汉书》传播与影响的继续扩大
- [237] 第三节 《汉书》对后世文学的影响
- [238] 一、成为后世史文的楷模
- [239] 二、对其他文体的影响
- [241] 三、对后世文学素材等方面的影响
- [244] 结 语
- [246] 主要参考文献
- [253] 后 记



绪 论

一、课题的意义与思路

刘勰有言：“夫设文之体有常，变文之数无方，何以明其然耶？凡诗赋书记，名理相因，此有常之体也；文辞气力，通变则久，此无方之数也。”^①对此，马茂元阐释说：“在文学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就其不变的实质而言则为‘通’；就其日新月异的现象而言则为‘变’。必须于‘通’中求‘变’，不‘变’则‘穷’。事实上，任何事物都是不断地向前发展着，推进着，没有尽头的。”^②中国古代历史散文的

① 刘勰：《文心雕龙·通变》。

② 《马茂元说唐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56页。

演进历程,同样体现了这一通变的发展规律。

中华民族是一个极重传统的民族,对历史的主动记载可谓源远流长。历史散文由夏、商滥觞,至西周而初成于《尚书》^①,然而,直至《春秋》的出现,方才奠定了严格意义上的编年体。而被汉人立为“《春秋》三传”之一的《左传》,更是首次将先秦历史散文推向了全面的成熟。与《左传》时间相前后的《国语》,则以国别体的形式出现。《世本》一书开创了分题记史等新体例,对后世影响极大。先秦晚期策士纵横形势下出现的《战国策》,呈现了历史散文自先秦至两汉转变的另一些特点。

诞生于西汉大一统特别是汉武帝恢弘政治背景中的纪传体巨著《史记》,体现了文化整合的特征,《史记》吸纳百家,自铸伟辞,堪称历史的黄钟大吕,历史散文的最高丰碑。

《汉书》继踵《史记》,千载而下,《史》、《汉》并重。但东汉以来,无论就《汉书》的史学地位,还是其文学意义,又总是见仁见智,意见纷呈。古代对《汉书》的研究虽不以文学为中心,却不乏对其文学成就充分肯定者。但现代以来,特别是建国后相当长的时期内,由于种种原因,造成了对《汉书》从思想到艺术的有欠公正的全面贬抑^②。

我们当然不能忽视前代历史散文特别是《史记》对《汉书》的影响力,更不必讳言《史记》巨大的文学成就实令《汉书》及后世一切史著无法超越,但同样要认识到《汉书》自身的独特存在,而且认识到《汉书》独到的文学价值乃是扭转《汉书》文学研究现状的根本前提。其实,《汉书》独到的文学价值不在对《史记》的模仿与步趋,而在体现时代与个性特色的创新。文学发展与时代风气实不可分,时运交移,文学风貌也会随之而变。对于“一代有一代之文学”

① 一般认为,《尚书》中的《虞书》、《夏书》属后人追记,《商书》中的部分作品当是殷人的可靠记录,而总体经过周人的加工整理。

② 详见绪论第二部分。

的论断,人们往往只对其作宏观方面的理解,其实,从相对微观的角度来看,也应当如此。如以汉代文学为例,西汉后期文学不同于西汉前期,东汉晚期文学也不同于东汉早期。文学史总是在复古与新变的结合中曲折发展,评判不同时期的文学,应当有历史、辩证的眼光,而不便揆之以简单划一的标准。就《史》、《汉》而言,如从历史散文追求的最高目标即真(不虚美、不隐恶)、善(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美(重文采)的完美结合来看,二者也可谓各有高低。而单从文学角度言,《汉书》自古即受人重视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正在于它自有其独到而不可忽略的文学成就。只是,时代政治的差异造成士风与文风的不同,文学本身的风貌也因时而变,班固的谨严与内敛又截然不同于司马迁的浪漫与外放,因之,评价《汉书》文学特征便不能套用评价《史记》的标准。如果囿于一种文学评价标准,则极可能造成对《汉书》文学特色的视而不见。当我们从历史散文的进程中来考察《汉书》,并换一种视角观照它时,则会发现,《汉书》具有严谨有方而又曲折多变的结构及叙述形式,其语言典则而不乏灵动,情感虽内敛而仍然丰富复杂,绝不像有些论者说的那样缺乏感情,更非所谓的“历史帐单”。较之《史记》的“不拘于史法,不囿于字句”(鲁迅《汉文学史纲要》语),《汉书》在叙事体例、叙事内容及语言锤炼方面更为精当。同样,与《史记》雄放酣畅的风格不同,《汉书》整体上呈现一种在严格法度之下具有的雍容娴雅之美。要之,《汉书》同样足以成一家之言,在文学史上也应有其独立的地位。

本书试图将《汉书》置于历史散文进程的大背景之下,以不同的观照角度与讨论方法,力求更加历史与客观地解析《汉书》,以全面发掘《汉书》在文学史上的意义,揭示《汉书》独特的审美内涵,纠正长期以来对《汉书》文学意义认识的不足。应当说,对《汉书》文学研究的开拓,无疑会使《汉书》研究真正走向全面与深入,并为中国古代散文研究开辟一点新思路。

本书拟设《汉书》的创作及其文学特征,《汉书》的结构形态、叙

事艺术、话语特色及文学影响等五章。需要说明的是,本书意在揭示《汉书》的文学及文学史意义,但从汉代文学的大势来看,仍然基本继承了先秦文史哲混同一体的传统,所谓文学创作整体上并未脱离政教和实用的范围,文学思想尚未自觉,因而不可能有后代完全意义上的文学创作。又,《汉书》与《史记》一样,首先是一部历史著作,其次才是一部文学著作,而且并非其全部内容都具有文学性。重视并把握《汉书》的史学特征是研究《汉书》文学意义的前提,可以说,撇开史学本质来谈《汉书》的文学是不可能的。因此,研究《汉书》的文学性既要放眼中国文学的历史长河,又要回到《汉书》的历史时代与其文本本位。另外,《汉书》与《史记》的密切关联也是不容忽略的,特别是《汉书》武帝以前与《史记》的内容,因有大量的重合,历来众说纷纭。我们必须看到,班固借用《史记》是不得不然,而且也体现了自己一定的创造性,使其在相当程度上带有自己的风格,因而这一部分虽一般不作为重点探讨的对象,但也并不有意绕过。至于《史》、《汉》比较的内容,将分述于各章之中,而不另列专章论述。

在本书中,形成《汉书》体例和特色的根由、如何看待班固的思想情感矛盾以及《汉书》文学个性与审美内涵的全面阐发等将是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具体地说,本书拟解决的主要问题有:从历史散文发展进程看,《史记》为何具有不可重复性以及《汉书》对其超越与局限之问题;班固在东汉谶纬昌盛的时代环境下,如何处理谶纬神学与揭示历史本身之规律的问题以及《汉书》的宣汉、颂汉问题;班固的颂、谏、情、理矛盾与调和等问题;《汉书》结构上严谨不苟与圆融通达相统一的问题;《汉书》叙事上平实与活泼相统一的问题;《汉书》语言上典雅与通俗相统一的问题;《汉书》美学上温厚雍容与灵动相统一的问题等等。

本书拟采取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研究方法。

如前所论,研究《汉书》既要以通史的眼光,即将班固和《汉书》

的研究放在先秦两汉政治及文化发展的大背景之下,总结先秦两汉历史散文的流变,从整体上认识《汉书》的文本特征,又要在此基础上,深入文本之内,实事求是地细致解析,力避“游谈无根”的架空之论。

研究古典文学最基本的仍然是文史结合、排比分析的方法。文学乃是扎根于历史时代之中,既是作者的创造,更是历史的产物。作家虽有其各自不同的人生经历和个性思想,但更多的还是受时代风尚的影响与制约。唯有从第一手资料出发,知人论世,才能真正认识一个作家或一部作品。对于班固和《汉书》的研究,既需要充分认识两汉政治及文化的大背景,又需要深入研究班固家学及其生平和创作道路,将班固与汉代其他作家、《汉书》与《史记》等作品进行多方比较,做到宏观把握与微观分析的有机结合。

当然,采取文史结合的传统之路,又需避免陷入繁琐考释而无所创新。如以西方文论的共时性与历时性观点分析先秦两汉文化和文学的内外新变,尤其突出《汉书》文学个性的成因,或许会有一些新的发现。文学史的传承与新变总是相反相成、矛盾统一的,一部作品内部同样存在思想和情感以至形式上的矛盾统一,在比照分析的基础上,适当融合西方现代美学及心理学的观念,也将是本书拟采用的论证方法之一。借鉴西方文论,重在其与中国传统的融合与贯通。

通过对《汉书》及先秦两汉历史散文的深入解读,定位并认识《汉书》的个性,特别是把握《汉书》的叙事特征,无疑要尽量吸收古今中外的叙事理论。

本书将力图融通古今、适当吸取新的理念与新的方法,而不是简单套用所谓新理论、新方法,才能在求实中创新。全书整体架构上,将试图建立一种立体式的纵横考察、深层次研究作家作品的模式。

本书将在深入文本、充分总结并继承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力求创新性发现。

本书所引《汉书》文字,如无特别注明,均依据中华书局 1962 年点校出版的颜师古注本。

二、《汉书》文学研究回顾

《汉书》一出,即大受重视,学者莫不习诵,但《汉书》与《史记》一样,首先是史学名著而非文学著作,这就决定了对其文学研究离不开其史学特质。然而,与《史记》不同的是,尽管古代《史记》与《汉书》的文学方面研究均多为零星的评述与感悟,以简要概括与评点的方式为主,而缺乏系统研究,但现代以来,《史记》文学研究则逐渐呈现出一片辉煌,且前景似乎更加灿烂;相形之下,因种种原因造成对《汉书》文学成就的忽视与贬低,使得《汉书》文学研究至今仍在低谷徘徊,而尚未出现一部独立的《汉书》文学研究专著。

1. 古代《汉书》文学研究简史

凌稚隆《汉书评林》引胡应麟语曰:“班、马之书,晋、隋以前,习其义者,不啻百家,而于词忽焉。唐、宋以后,习其词者,亦且百家,而于义疏焉。故《史》、《汉》之学,盛于六代之前,而其文贵于六代之后,盖至明而极矣!”^①《汉书》在古代被推重及其研究状况,于此可以想见^②。有唐以前,宫廷讲习《汉书》风气特浓,民间授受《汉书》也蔚然成风,《汉书》地位实在《史记》之上。自汉末至南北朝,代有注疏及评析义理之人,《后汉书·班彪列传赞》“不激诡,不抑抗,赡而不秽,详而有体”之评,实为《汉书》文学特色的精到概括,也给后世《汉书》文学研究奠定了基调。

至隋唐五代时期,正式形成“汉书之学”,唐颜师古《汉书集注》

① 凌稚隆:《汉书评林·总评》。

② 关于《汉书》在古代的传播情况,详见第五章第二节内容。

为注疏之大成,刘知几《史通》为前代史学的全面总结,二书更为研究《汉书》文学搭建了良好的平台。而唐代中后期一些散文家的品评虽仍简括,但却值得重视,如独孤及曾批评:“荀、孟朴而少文,屈、宋华而无根。有以取正,其贾生、史迁、班孟坚云尔。”^①梁肃也称:“三代之后,其流派别,炎汉制度以霸、王道杂之,故其文亦二:贾生、马迁、刘向、班固,其文博厚,出于王风者也。”^②二人将马、班之文同归醇正厚博,于司马迁虽不尽符合,于班固则颇得其旨。李翱曰:“前汉事迹,灼然传在人口者,以司马迁、班固叙述高简之工,故学者悦而习焉,其读之详也。”^③在李翱眼里,马、班于叙事工简上无分轩輊。

宋代洪迈所论与李翱略同:“班固著《汉书》,制作之工,如《英》、《莖》、《咸》、《韶》,音节超诣,后之为史者,莫能及其仿佛,可谓尽善矣。”^④洪氏以为《后汉书》等后世正史制作之精工均远不及《史》、《汉》,这也是古今很多学人的共识。宋代散文大家苏轼、黄庭坚对《汉书》文笔都很推崇,黄庭坚甚至说:“每相聚,辄读《前汉书》数叶,甚佳。人胸中久不用古人浇灌之,则尘俗生其间,照镜则面目可憎,对人语亦无味也。”^⑤宋学偏重义理,思想敏锐,然好疑古,尚高论,在此风气之下,也出现低评《汉书》甚至全面否定《汉书》者,如苏洵贬斥班固“贵谀伪,贱死义”^⑥,叶适也批评《汉书》“浅近重复,往往不过常人知识之所能及”^⑦。而全盘否定《汉书》者,当以郑樵为最,其《通志·总序》斥班固为浮华之士,《汉书》为专事剽窃之作,未免一叶障目。而在宋学专门之学兴起的背景下,

① 见董诰等《全唐文》卷五一八梁肃《常州刺史独孤及集后序》所引。

② 董诰等:《全唐文》卷五一八梁肃《补阙李君前集序》。

③ 董诰等:《全唐文》卷六三五李翱《答皇甫湜书》。

④ 洪迈:《容斋随笔·三笔》。

⑤ 凌稚隆:《汉书评林·总评》。

⑥ 苏洵:《嘉祐集》卷九。

⑦ 叶适:《习学记言序目·汉书》。

又正式形成了“马班异同”之学，其中，倪思《班马异同》对勘《史》、《汉》二书，指出《史记》笔力雄放，《汉书》体例严整，较为实事求是。

明代文学评点风气盛行，出现了多种《汉书》评点著作，而以凌稚隆所辑《汉书评林》集其大成。它荟萃东汉至明代一百七十家评论资料，引书达百余种，评论涉及语言文字、历史事件、人物形象、文章技巧、作史宗旨等各方面，所录对《汉书》文学评价总体较高。如“总评”引何良俊语曰：“班孟坚书，虽无太史公之奇，然叙事典赡，亦自成一家之言。”又引其父凌约言评论曰：“子长之文豪，如老将用兵，纵骋不可羁，而自中于律；孟坚之文整，方之武事，其游奇布列不爽尺寸，而部勒雍容可观，殆有儒将之风焉。虽诸家机轴变幻不同，然要皆文章之绝技也。”^①茅坤不但编有《汉书评抄》，且于《刻汉书评林序》曰：“太史公与班掾之材，固各天授，然《史记》以风神胜，而《汉书》以矩矱胜。唯其以风神胜，故其遒逸疏宕如餐霞，如啮雪，往往自眉睫之所及，而指次心思之所不及，令人读之，解颐不已；唯其以矩矱胜，故其规划布置，如绳引，如斧刳，亦往往于其复乱庞杂之间，而有以极其首尾节奏之密，令人读之，鲜不濯筋而洞髓者。”茅氏评价《史》、《汉》二书风格，可谓各有千秋。

清代为古代学术的集大成时期，也是《汉书》研究的集大成时期，对《史》、《汉》加以比较，对马、班异同的认识也较以前有突出的进步。清初顾炎武认为“班孟坚为书，束于成格而不及变化”^②，此论有一定道理而未能把握关键。章学诚总结《史》、《汉》二书特色谓：“马则近于圆而神，班则近于方以智。”^③概括极为精到，广为后人认同。蒋中和则欲先求是非而后论异同，以为马、班优劣更在于识见之高下，马、班区别主要在于班固之史识远不如司马迁，而不在于表面的异同^④。唯沈德潜持论更为公允：“平心以求之，有马

① 凌稚隆：《汉书评林·总评》。

② 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六。

③ 章学诚：《文史通义·书教下》。

④ 见蒋中和《眉子半农斋集》卷二《马班异同议》，康熙二十年刻本。